

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

An Overview and Reflection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the 20th Century

唐 萌 (Tang Meng) **

早在 19 世紀末，中國與東歐國家就展開了文化交流，捷克斯洛伐克的漢學研究由此興起。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也經歷了孕育期、開創期、興盛期和調整期等階段。隨著中東歐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21 世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回顧總結中捷文化交流的發展歷史，吸取教訓，總結經驗，為未來文化發展提供借鑒。

一、20 世紀捷克漢學的發展歷程

捷克漢學研究起步於中捷建交（1949 年）以前。20 世紀中葉，為鞏固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大陸與東歐國家形成政治聯盟，雙方關係全面發展，捷克漢學也借此迎來了發展契機。1968 年，受「布拉格之春」事件影響，捷克漢學一度式微，直到 1989 年以後，漢學研究整體情況才有所改善。回顧 20 世紀捷克漢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孕育、開創、興盛和調整四個階段。

（一）捷克漢學的孕育期

中捷文化交流的歷史可以上溯至清代雍正年間。捷克傳教士嚴嘉樂（Karel Slavíček）到中國的傳教活動開啟了中捷文化的早期交流。嚴嘉樂 1678 年生於捷克，1735 年死於北京，葬於阜成門外。1716 年，嚴嘉樂來到中國傳教，受到當時雍正皇帝的接見。他在數學、天文、音樂等方面的造詣受到了當時清代皇室的賞識。1716 年到 1735 年，近 20 年的中國生活，他寫下了大量的信件，

記錄了他在中國的活動與見聞，內容涉及當時中國的民俗、天文、官制、藝術等方面，上自皇宮，下至市井。與 13 世紀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記載亞洲見聞的《馬可·波羅紀》（又名《馬可·波羅遊記》、《東方聞見錄》、《寰宇記》）一樣，這些信件所描述的「中國印象」激起了捷克人對中國的嚮往，為捷克人打開了通往中國的大門。這些信件後被輯成《從中國寄回祖國的信件》一書，是書於 2002 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中譯名《中國來信》。嚴嘉樂《中國來信》的出現證明，早在 17、18 世紀的清代，伴隨著中西方之間的接觸與交流，捷克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的認識與介紹工作。只是這時候尚處於文化介紹層面，算不上嚴格的漢學研究。但這些工作為日後的捷克漢學打下了基礎。

（二）捷克漢學的開創期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期是捷克漢學的開創期，這一時期出現了譯介中國文學的作品，並且有少數漢學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開創捷克漢學的先驅有如下三位：August Feitmayer（奧古斯特·菲特馬伊爾，1818-1878）、Rudolf Dvořák（魯道夫·德沃夏克，1862-1920）、Jaroslav Průšek（普實克，1906-1980）。

August Feitmayer 是最早以捷克語翻譯中國二十五史的學者。他選譯了二十五史中的部分內容，這些譯著是最早的捷克漢學研究成果。遺憾的是，August Feitmayer 對中國的首次「觸電」並未得到其他人的回應。在他去

* 本文為河北省教育廳項目「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階段性成果。

** 作者為河北地質大學社科部捷克研究中心講師。

世後的 1882 年，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學恢復辦學，正式拉開了捷克漢學研究的序幕。

查理大學，全稱布拉格查理大學，成立於 1348 年。由德意志國王查理四世創辦，是捷克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大學，也是中歐最古老的大學。1882 年恢復辦學後，查理大學培養了一大批漢學研究者，為捷克漢學研究提供了人員保障。查理大學培養的很多學生日後成為捷克漢學的中流砥柱，最傑出的漢學研究者是 Rudolf Dvořák。他不僅是一位興趣廣泛的科學家，還是一位熱衷東方文化的翻譯家。他最早翻譯了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詩歌經典——《詩經·國風》（1897），還翻譯了中國古代的道家經典——《道德經》（1920）。除了譯作，Rudolf Dvořák 還出版了《中國孔夫子的生平及其學說》（1889）與《中國的宗教》（1895）兩部學術著作，這些成果得到學界的公認。與 Rudolf Dvořák 合作翻譯《詩經·國風》的另一位學者是 Jaroslav Průšek，通譯為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生於布拉格，中學畢業後考入查理大學哲學院，開始學習古希臘、古羅馬等古代歷史，因對東方國家感興趣而改學漢語。後轉益多師，師從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德國著名漢學家哈龍（Gustav Haloun）、萊比錫漢學家黑尼施等。大學畢業，完成論文「西元前 11 世紀至 4 世紀的中國與狄族」。20 世紀 30 年代，Jaroslav Průšek 受邀到美國講授中國文學課程。二戰結束後，他在查理大學哲學院任教，正式講授中國語言文學，開設第一批漢語班，系統授課。與此前學者零星的譯介中國作品相比，這一時期的漢語教學、漢學普及工作有了質的飛躍。而就普實克本人，他的畢業論文以及〈新中國的文學及其民間傳統〉、〈中國 20 世紀早期小說中敘述模式的變化〉、〈中國文學的三個概述〉三部學術著作在當時的學術界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普實克也被國際上公認為「捷克漢學集大成者、里程碑式的人物」。

除查理大學以外，捷克另一個重要的漢學研究基地是成立於 1922 年的布拉格東方研究所。該研究所由捷克第一任總統 Martha Streck 資助成立。研究所分為三個部門：非洲和近東部、南亞部、東亞部。20 世紀 30 年代前後，以普實克為首的漢學研究者陸續調任至東方研究所工作。此後，這一批漢學家在這裡辛勤耕耘，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

（三）捷克漢學的興盛期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大陸與東歐國家關係得到了全面發展。在此國際背景下，捷克漢學研究迎來了它的春天。繼查理大學恢復辦學、東方研究所成立以後，捷克漢學在場所、人員、資料、經費諸多方面都具備了一定的條件。這一時期，捷克漢學界湧現出一大批學者，他們的研究在學術方法、研究領域、成果品質等方面都實現了新突破。這些成果標誌著 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的最高水準。

20 世紀 50 年代從事捷克漢學研究的學者主要有：Zdeněk Hrdlička（何德理）、Josef Kolmaš（高馬士）、Marian Galik（高利克）、Danuška Štovičková（史丹妮）、Augustin Palát（白利德）、Oldřich Král（克拉爾）、Zdenka Heřmanová（傅思端）、Olga Lomová（羅然）、Lucie Olivová（包捷）、Eva Rychterová（愛娃·裡赫特洛娃）、Josef Hejzlar（約瑟夫·海茲拉爾）、Milena Horáková（米列娜·霍拉科娃）等。

這一時期的捷克漢學界不僅人才濟濟，還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就普實克一人而言，「普實克一生發表的論著從 1931 年至 1991 年止共有 481 篇（部）之多，從他逝世的 1980 年到 1991 年這十年間仍不斷有作品印行出版。這些著作大部分是關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及譯介，另外，還有一些關於中國語言、文化及歷史方面的著作。」其他漢學家也在不同的領域開墾耕耘，主要涉及文學、歷史、藝術、宗教、哲學、醫學等門類。有關這一時期的成果情況將在本文第二部分進行詳述。

（四）捷克漢學的調整期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發，捷克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中捷關係急轉直下，捷克漢學也在此時遭遇「瓶頸」。普實克被撤銷東方研究所所長一職，研究所中的漢語圖書館被封，布拉格的漢學研究者們的成果被禁，他們被趕出大學和研究所，甚至被迫離開捷克。「自 1974 年始，在蘇聯及東歐國各家出版物中不再引用任何與布拉格漢學學派有關的文章及觀點。」至 1980 年 4 月普實克去世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捷克漢學研究處於停

滯狀態。直到 20 世紀 80、90 年代，捷克小說家 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傳播到中國，中捷文化交流再次迎來高潮。由政治因素所導致的捷克漢學研究的「中止」並非「終止」，當政治高壓解除，捷克漢學研究也開始恢復。應該說，這一時期是捷克漢學發展過程中必要的調整階段。

20 世紀捷克漢學的發展經歷興衰起伏，我們應該看到，捷克漢學家們自覺地承擔起文化交流的「使者」職責，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促進中捷、中東歐地區之間的認識與互信，增強中捷、中東歐民族之間的瞭解與互助，建立中國與東方國家的文化、經濟等多方合作，起到「導夫先路」的作用。進入 21 世紀以後，特別是在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計畫以來，捷克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國，中捷兩國展開全面的交流合作，捷克的漢學發展將迎來新的契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以政治、經濟為引領的政策主旋律之下，捷克漢學仍然應該保持其獨立的學科身分，盡可能地使漢學與政治和經濟政策分離開來。

二、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的特點

20 世紀捷克漢學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現選取十餘位卓有建樹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漢學家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羅列如表，並對這些成果進行一些總結，以觀照 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的特點。

表：20 世紀捷克著名漢學家代表成果

捷克漢學家 和研究機構	主要論著與出版品
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1906- 1980)	〈新中國的文學及其民間傳統〉、〈中國 20 世紀早期小說中敘述模式的變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中國文學的三個概述》、《創造歷史的人物》、《B.C.1400-B.C.300 的中國諸侯國和北狄》、《中國歷史和文學》、《吶喊》（譯）、《老殘遊記》（譯）、《子夜》（譯）、《聊齋志異》（譯）、《論語》（譯）、《孫子兵法》（譯）、《中國，我的姐妹》
米蓮娜·多列熱諾娃 (Mirena. Dorněnova, 1932-)	《魯迅的「藥」》、《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1900-1949 年中國文學選讀 1. 小說》、《中國的理論與批評 2. 中國前期現代戲劇與小說理論》、《歐洲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五四運動的重負》

捷克漢學家 和研究機構	主要論著與出版品
薇娜·何德里奇克娃 (Vina, Kolderičko, 1924-)、茲·何德里奇克 (Zil. Kolderi, 1919-1999) 夫妻	《中國古代小說》、《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史》、《中國與日本說書人的傳統與個體創造性》、《漢學引論》、《中國當代小說》（譯）、《敦煌講經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神宗皇帝時的中國》、《插花，盆景》
丹娜·卡沃多娃 (Dana. Kavoltova, 1929-)	《中國戲劇》、《關漢卿》、《六月雪》及其他劇作》（譯）、《川劇的源頭及特性》、《孔尚任 桃花扇》（譯）、《中國戲劇最早期歷史》、《東方戲劇文化》、《孔尚任《桃花扇》劇中的時空關係》、《中國戲劇》、《明代戲曲的部分研究》（捷文書名《論孔尚任的《桃花扇》》）
歐德里奇·克拉爾 (Ondřej. Klar, 1930-)	《家》（譯）、《林家鋪子》（譯）、《儒林外史》（譯）、《中國古典小說《儒林外史》的某些藝術表現手法》、《中國小說的藝術》、《道——中國古代文學選集》、《紅樓夢》一百二十回（譯）、《六祖壇經》（譯）、《莊子·內篇》（譯）、《通過翻譯正確表達原文》、《易經》（譯）、《中國思想的闡釋傳統》、《中國美學思想的象徵及符號模式》、《文心雕龍》（譯）
奧古斯金·巴拉特 (Augstin. Palat, 1923-)	《中國中世紀社會與風俗》、《水滸傳》（選譯）
梯莫特烏斯·波柯拉 (Timodeuš. Bokla, 1928-1985)	《論衡》（選譯）
歐德里奇·施瓦爾尼 (Ondřej. Svarný, 1920-)	《漢語口語介紹》、《漢語（北京話）的重音和語調模式功能特徵》、《漢語（北京話）重音和語調模式特徵：重音和語調模式音標及統計表》、《現代漢語語法實例》、《現代漢語常用語彙彙編》、《遠東文化傳統》
茲登卡·赫日瑪諾娃·諾沃特娜 (Zděnka. Hermanova-Novotna, 1930-)	《西遊記》（選譯）
達努施卡·赫洛多娃·史卻維契柯娃 (Danuška. Hernova-Svičková, 1929-1976)	九卷本《捷漢詞典》主要編寫者

捷克漢學家 和研究機構	主要論著與出版品
雅爾米拉·卡羅斯科娃 (Jarmira Kareskova, 1908-1989)	《現代漢語動態詞研究》
約瑟夫·科爾馬什 (Josef. Kermaš, 1933-)	《黑潭龍》(白居易詩選)(譯)再版改名 《杏園中的棗樹》、《佛國記》、《嚴嘉樂從 中國寄回的信》、《1913-1914年的西藏能自 行和另一個國家建立條約關係嗎?》、《布拉 格收藏的德格藏文印本書》、《西藏靈書》
雅羅米爾·沃哈拉 (Jaromír Vochala, 1927-)、王如珍 (1934-) 夫妻	《漢語口語》
東方研究所	《東方檔案》、《新東方》、《東方檔案增 刊》、《圖書編目服務》、《ArOr—東方檔案 —捷克系列》、《著作》

從以上所列的研究成果來看，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 研究涉及領域廣泛

20 世紀捷克漢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也是最難得之處就是：研究領域廣泛。漢學家的研究涉及了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眾多方面。按時代劃分，有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老子》、《周易》，漢代的《論衡》，魏晉南北朝的《文心雕龍》，唐代白居易的詩歌，明清小說《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現當代作品有《林家鋪子》、《家》、《藥》等。按類型劃分，涉及文學、哲學、宗教、史學、文藝學、語言學、目錄學、文獻學、民俗學等學科相關的作品。在 20 世紀中捷建交伊始，作品的譯介工作方興未艾，漢學家就已經開始了廣泛地涉獵中國文化。大到論「道」，小到談「盆栽」、「廚藝」，他們憑藉著對中國文化的熱情與探索精神開疆拓土，艱難前進。

(二) 集中於經典作品

所謂經典，是指「能夠禁得住時間核對總和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漢學研究所集中的作品大多是中國的傳世經典，既包括古代經典《紅樓夢》、《西遊記》《論

語》、《文心雕龍》等，也包括現當代作家作品，如魯迅、茅盾、冰心、巴金等。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這些作品都正是中國學界研究的「熱門」。中國學界的研究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捷克漢學的研究走向。而對於經典作品的研究來說，中捷學人不謀而合。這表明：其一，中國的經典作品的確具有「超越地域、階級、種族、族群的普適性價值和意義」；其二，經典作品本身烙印著的中國痕跡仍然煥發著無盡的光芒，吸引著海外漢學家的青睞。

(三) 獨到的學術眼光

獨到的學術眼光是捷克漢學家的漢學研究最有價值之處，也是成就漢學大師的關鍵。以普實克為例，〈新中國的文學及其民間傳統〉、〈中國 20 世紀早期小說中敘述模式的變化〉以及〈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是體現普實克關於中國 20 世紀文學研究觀點及思想的代表作。〈新中國的文學及其民間傳統〉一文注意到了 1949 年後的新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包含著古代中國的民俗因素，重點分析建國後中國北方的通俗小說與宋、明時期通俗小說、戲曲之間的關聯。從民間因素入手，考察新、舊時代文學作品之間的傳承與變革，反映了普實克獨到的學術眼光。在今天看來，這個論題本身仍具有一定的學術前瞻性。再比如，〈中國 20 世紀早期小說中敘述模式的變化〉一文於 1970 年出版，在這篇文章中，普實克通過考察大量的中國 20 世紀早期的小說作品，得出結論：在大多著名晚清小說中的內部結構的變化還不能導致現代文學的產生，因為現代中國文學的誕生要求社會的相應變革和作者新觀念的產生。研究所選取的中國 20 世紀早期的小說這一研究對象，在 20 世紀中葉的捷克即是全新的甚至是石破天驚的，這當然與普實克的來華經歷與交友有關。但在當時，中捷建交伊始的國際環境下，這樣的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創新性與開拓意義。而在此後的 80 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的陳平原才以「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為題，寫作博士論文。陳平原教授也承認：「在討論中國小說的『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時，我曾借鑒了普實克的觀點。」

（四）中歐學術交流的產物

近代中國講「西學東漸」，學術上追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很多學者嘗試以西方理論為武器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這其中固然存在隔閡與分歧，但還是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比如，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思想來研究《紅樓夢》。他借用叔本華對「人生與欲問題的分析」，又借用康德關於「美」的看法，得出這樣的認識：《紅樓夢》的價值在於描寫人生之痛苦及其解脫之道，由人欲所造成的悲劇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不惟此，1956年，捷克漢學家克拉爾即運用比較文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論巨著——《文心雕龍》，寫作題為〈文心雕龍——論中國文學藝術思想〉的副教授論文。1993年克拉爾在香港召開的亞非學會議上又作了題為〈論「象」的中國美學思想〉的學術報告。這些成果的過人之處，在於漢學家善於運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觀照中國古代文學，漢學家們在超越古今、跨越國界的兩種文化間找到了共性。無論是文化傳統還是思維方式，異質文化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反而是在互相借鑒與融合的過程中得以發展。因此，他們的研究是中西交流的產物，同時也是中歐文化發展的見證。

三、20世紀捷克漢學研究的反思與啟示

通過回顧總結20世紀中捷文化交流的發展歷史與捷克漢學研究的特點，我們看到，捷克漢學的發展之路並不平順。進入21世紀，我們應該以史為鑒，總結經驗。

（一）傳承本土情懷，開拓國際視野

縱觀20世紀捷克漢學家的人生歷程，他們的一生幾乎與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國共同成長。他們在捷克出生、成長，完成學業之後，又在這裡任教、從事科研工作。他們選擇在故鄉完成個人的人生理想——漢學。漢學對於捷克人而言，是一門新興的外國文化。從認識這門文化到研究這門文化，首先要打開心扉接納來自異域的新事物。捷克學人投身漢學研究不僅僅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更重要的是漢學家植根於內心深處的對中

國的依戀與關切。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有過多國留學經歷，最終他們都選擇了回國效力。他們將在國外學到的知識與方法帶回捷克，為捷克的文化事業注入了新鮮血液。在中捷關係的友好時期，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擔任過訪華使團的捷語翻譯，為中捷友好互訪做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工作。「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後，中捷、中歐關係一度緊張，包括普實克在內的很多漢學家遭受迫害，作品被禁。但即便如此，大多數人始終沒有停止研究工作。比如，《儒林外史》、《文心雕龍》的譯者克拉爾。1969年，克拉爾受到迫害，停掉查理大學的任職，1971年被開除。但克拉爾並未離開捷克，也未終止他的漢學事業，反而在布拉格東方藝術研究館找到了新的研究領域——中國繪畫與書法，並翻譯了相關的畫論文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紅樓夢》的翻譯工作也在這一時期完成。無論是和平年代，漢學家師他國之長技為本國效力；還是在政治高壓時期，漢學家堅守「陣地」，對漢學工作的不離不棄，這二者都反映出捷克漢學家強烈的本土情懷。正是這種情懷，支撐著他們的漢學事業。

閻純德教授在〈漢學歷史和學術形態〉一文中指出：「漢學作為外國人認識中國及其文化的橋樑，是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撞擊後派生出來的學問，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另一種形式的自然延伸。」海外漢學家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本質上是一種指向外國的研究視域。對於捷克漢學家來說，中國是外國，中華民族的文化與其相比是淵源不同的異質文化。如果沒有開闊的視域，於長遠處著眼，所謂的「漢學」也不會存在。同理，對於中國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而言，中國是本土，世界各國的文化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不同的文化，比較文學研究者同樣需要立足傳統，並以開闊的視野接納異質文化。對於中國人而言，漢學是一面照鑒本國文化的鏡子。它讓國人重新認識本國文化，審視文化傳承中的得失。只有兼顧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域外，才能真正推進文化的進步。所以，傳承本土情懷，開拓國際視野在當今的漢學研究以及其他的國別研究中仍具有重要意義。

（二）打破文化壁壘，促進中外結合

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可以上溯至西元5-6世紀，西斯拉夫人從維斯瓦河、易北河上游西遷至今斯洛伐克和

捷克地區。但是，由於捷克貴族長期依附羅馬帝國、內部的階級矛盾激烈，長久以來，捷克斯洛伐克並未形成獨立的文化傳統，而是受羅馬文化的影響較深。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文明，文化淵源深厚。面對歷史不同、積澱不同的兩種文化，研究者首先要破除心中的「壁壘」，才能打破文化的「壁壘」。以《儒林外史》的研究為例，作為清代的一部長篇小說，研究者所關注的更多的是小說本身的內容，包括時代特徵、人物形象的典型意義以及小說的思想價值。對於漢學家克拉爾來說，《儒林外史》所具備的「時代特徵」、「歷史意義」被有意淡化，他所關注的是《儒林外史》作為一個單純的小說文本的寫作方法、結構形式、藝術表達。而關注文本本身，將文學文本視作一個藝術系統，注重結構形式的分析，這是典型的「布拉格結構主義」的學術研究方法。克拉爾正是借助這種方法研究《儒林外史》，並在1957年完成了研究生論文「《儒林外史》的藝術手法」。應該說，這篇成果是早期捷克漢學研究成果的優秀代表，也是中捷文化融合的歷史見證。

隨著捷克漢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捷克作品傳播到中國。20世紀後期，中國掀起了一股「米蘭昆德拉」熱。米蘭昆德拉是20世紀出生於捷克的著名小說家，他的小說、詩歌以及文論都引起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界的研究熱潮。昆德拉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命運引發中國學者對當下處境的思考。其中，余杰在〈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從昆德拉和哈威爾談起〉一文提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問題，即知識分子對待社會的態度與選擇問題。有些人傾向於承擔社會責任，也有人選擇獨善其身。外國作品在中國的傳播不可避免地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讀者也在試圖重構作品。正如閻純德教授所言，「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不僅意味著中國文化『外化』的傳播，也意味著異質文化對中國文化『內化』的接受」。

（三）20世紀捷克漢學研究中政治因素的得失

捷克是典型的東歐小國，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國。建國後，捷克斯洛伐克又遭德國侵佔，後在蘇聯紅軍的

幫助下實現解放。1960年7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改國名「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此後進入社會主義陣營。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發，這段時間是捷克漢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同為遭受壓迫，渴望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東方國家，他們熱衷於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努力翻譯史書、經典作品，研究古人的成敗得失。這些工作說明：捷克學者試圖通過對中國等東方大國的研究獲得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中捷文化交流往往可以起到調和中捷政府之間相互衝突的政治意圖的重要作用。在捷克寄身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時期，中國與捷克的文化互訪密切，這為捷克漢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使得原本不同國別、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化淵源的兩國國家開始互相瞭解。從這一點來說，政治因素在中捷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捷克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相關專業被停課，許多學者被原單位開除，科研成果遭禁，而這一切與學者本身單純的學術研究並不相關。無疑，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捷克漢學的正常發展。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與經貿往來成為文化交流的權柄，它在制約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如果兩國之間的關係密切，那麼兩國的文化交流則成為一種自然之舉。反之，再深刻的文化淵源也將沉埋於政治高壓之中。

歷史上，大凡文學與時局相連，勢必會以文學為槓桿，以政治為支點進行思考。這幾乎成為學術、政治、歷史三者存在的一種內在規律。綜觀整個20世紀的捷克漢學研究，這是一個在世界格局、國家政局經歷劇變的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建國之初的國際背景下，捷克學者突破國別洲界，以極大的熱情與探索精神展開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亞洲國家的全面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一時期的捷克漢學研究者具有首創之功。其次，捷克漢學家在前無來者可鑒的中捷文化交流中，拓展研究視野、開闢研究領域，致力於學術研究方法的創新，對於當下的學術研究具有開示門徑的意義。